

“众星拱北，万水朝东”

——两份珍贵的文献见证光辉历史

穆学锋 郭海南

在台盟历史陈列馆里，分别展示着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和1948年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告台湾同胞书》。这些珍贵的文献，见证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那段光辉历史。

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共23条，其中第5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等解放区各大报纸也在头版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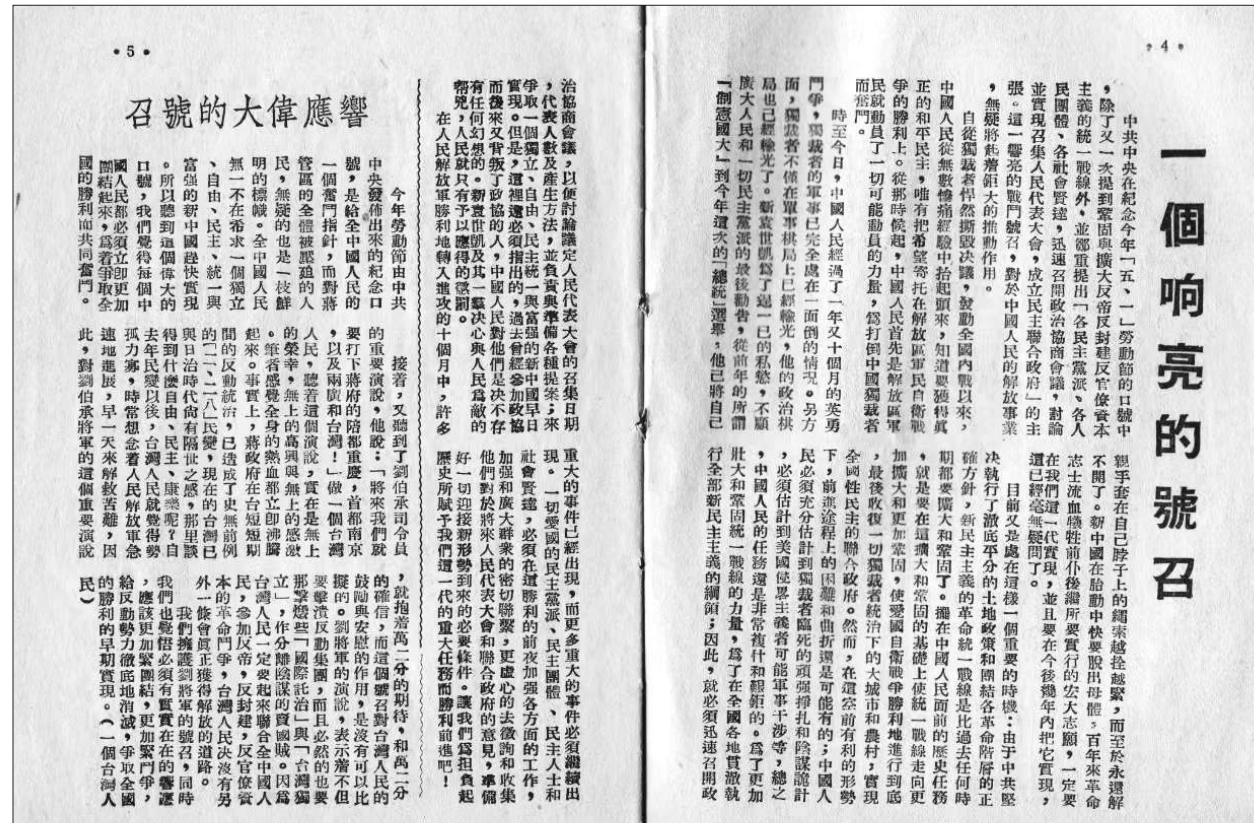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谈话，表示竭诚拥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及海外辗转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当时的盛况，真可谓“众星拱北，万水朝东”。

1948年5月1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出版的《新台湾丛刊》第6辑，开卷首篇为标明“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今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二篇题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文章《一个响亮的号召》。这是最早发表“五一口号”并予以热烈响应的报刊。

这一天，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意见。当天，李济深收到信后，第一时间与沈钧儒取得联系，第二天（5月2日）即同沈钧儒一道，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讨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李济深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来信的内容。大家一致商定，立即以联名通电的方式响应，并推举马叙伦起草电文。

1948年5月5日，李济深等12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正式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给毛泽东的通电文中指出：“乃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8月1日，毛泽东在复电中表



1948年5月1日，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办的《新台湾丛刊》刊发《一个响亮的号召》和《响应伟大的号召》，迅速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侯补）。

示：“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示，曷胜感荷。”

随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1948年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认为“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台湾人民才能由美蒋联合统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通过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举李锐、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5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指出：“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号召’，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6月9日，中国致公党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指出：“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号召’，忠诚地和全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

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

1948年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此次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积极奋斗。”6月1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对时局宣言》，认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主张，“就是加速胜利有力的号召，亦即是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巩固和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实现新中国的正确途径。”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中指出：“在卖国独裁的南京反动政权行将崩溃，人民的武力革命接近胜利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我们不仅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更愿本于孙先生之遗教，陈献我们的‘一得之愚’，以就教于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五一口号”发布时，九三学社因处在国统区，不宜公开发表声明。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

1949年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北平，北平即将和平解放。1月26日，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报》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表示“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党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本年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先生复宣布和平八项主张，同人等认为惟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谨此宣言。”与此同时，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组织下，多次召开座谈会，围绕新政协的性质、影响、任务以及召集者、召开时间、召开地点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建议，迅速掀起了一场以筹备新政协会议为核心内容，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的的新政协运动。

当时，台盟派出许多干部，到香港各地访问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说明目前国际形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发展情形、新政协与台湾的将来等，极力推动新政协运动，获得了各人民团体及各界开明士绅的赞成和拥护。

在香港开展的新政协运动，为民主人士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1948年8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安排下，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海陆两途北上赴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2月16日，台盟代表谢雪红和《大公报》记者李纯青以及宗教界人士吴耀宗等人离港北上。

当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55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强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谢雪红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为新政协的召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49年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提出：“党派单位方面增加了三个：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同日，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决定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代表名额5人，侯补代表1人。

从此，台盟就由原来的地方性政治团体，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经过广泛协商，最终确定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侯补代表）作为台盟代表出席新政协。

宝藏故事

参与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的“农民”

任宗儒



秦始皇陵铜车马

日前，秦始皇陵博物院将秦陵一号铜车马搬迁至秦陵铜车马博物馆，与二号铜车马13年后再次相聚，同时向公众展出。铜车马乔迁，远在周原博物院的陈权良格外开心。

陈权良是当年“叫醒”铜车马的人，与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1978年12月，这两乘青铜车马在秦始皇陵西出土时是3010个碎片，还不算断口、破洞和裂缝。

从1980年12月到1988年4月，文物工作者用8年时间完成了对铜车马的修复，陈权良是修复团队中的一员，并且承担了其中最为复杂关键的作色做旧工作。

时间倒回到1976年春天，由有关方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进驻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开始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因考古需要，考古队在周原遗址举办了为期亦农亦考古短训班，陈权良这位当地的青年农民，有幸成为第一期短训班学员，一个“泥腿子”当上了周原考古的“帮工”。

陈权良一定没有想到，这个短训班开启了他梦想的人生。

1978年6月，上海市博物馆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举办文物修复技术培训班，周原考古队派陈权良前往上海参加培训。在此之前，陈权良连县城都很少去，上海的繁华只在书本上读过。他无心游览黄浦江和南京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文物修复技术的学习和实践操作上，除了吃饭睡觉，整天泡在培训室里，仔细揣摩老师传授的知识，反复实践老师示范的修复技巧。即使是星期天，他也不出上海博物馆的大门。

半年时间里，陈权良以自己的刻苦勤奋，再加上很高的天赋和悟性，出色完成了学习任务，作为优秀学员顺利毕业。学成归来，陈权良一头扎进周原遗址临时搭建的文物修复室，用所学的知识技艺，开

始了发掘文物的修复工作。他将腐朽化为神奇，将破碎凌乱的陶片变成了精美的陶器，使锈迹斑斑、残缺破损的青铜器变得完好如初，熠熠生辉，许多传说和故事因他修复的一件件器物而变得真实、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时间里，陈权良在文物修复方面脱颖而出，他精湛的修复技术和完美的修复成果引起陕西省文物考古界的关注，这位年轻人逐渐成为闻名陕西的文物修复专家。陕西省文物局经常举荐他去解决文物修复遇到的难题，比如，茂陵博物馆镇馆之宝、国宝级文物“西汉鎏金马”的除锈保护，除锈技术相对简单，而保护则是对器物表面做涂层处理且不露痕迹，技术难度很大，陈权良不负所托，出色完成了任务。

1981年8月，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在大雨中坍塌，此后，文物界对宝塔地宫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1987年2月重修法门塔工程开工。在此期间，陈权良专注于受损文物的保护修复。宝塔坍塌后，4米多高的铜制塔尖从塔顶摔下来，七零八落。法门寺宝塔12层八角96个佛龛，每个佛龛里都有一尊铜制佛像，宝塔坍塌造成铜佛像损毁严重。

陈权良接受了法门寺的邀请，修复受损器物。他制定了详尽的修复方案，采用铆、焊、补、做旧等方法，将宝塔铜制塔尖还原完整如旧，现陈列在法门寺博物馆。

经年累月，从早到晚，陈权良修复考古发掘的文物，工作单调枯燥且不受关注。如今他已年过七旬，依然是个“农民”，但他是权威部门评定的工艺美术师，多次荣获国家有关部门和陕西省的表彰奖励。他常常去周原博物院展厅，看当年亲手修复的器物。他希望周原遗址“申遗”早日成功，希望周原早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宝藏物语

《乔木芳晖》：

张大千青绿山水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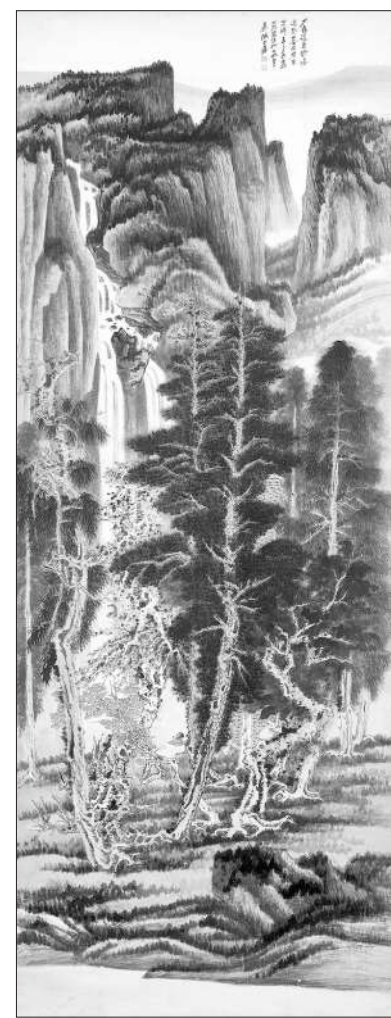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付裕

1947年3月，张大千绘制青绿山水巨制《乔木芳晖》。此作高近八尺，且取细长幅。乔木参天矗立，林荫下，高士倚琴侧坐，观瀑听风，悠然自得。

在画作中，张大千笔墨仿董源，又融入蜀中山水风貌，明丽精严而不失雅致，成为其笔青绿山水之代表。20世纪30年代晚期，张大千已开始收藏董源画作，《溪岸图》可能是最早者，后又相继购入《江堤晚景》《潇湘图》等。张大千曾悉心研习，反复临摹中锤炼笔墨，造诣日深。

此作曾于1947年5月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的“张大千近作展”中展出。如今仍保持原装裱、品相完好，有画家自署签条“丁亥三月装成记”。

此作近日在香港苏富比“清气娱怀——刘汉堃家族珍藏书画”专场中，以3070万港元成交。据了解，刘汉堃为近代纺织业巨擘刘国钧长子。刘国钧（1887-1978），江苏靖江人，经营纺织业，雅好书画。20世纪40年代，刘汉堃在港成立东南纺织有限公司，并成为香港纺织同业公会副会长，身后藏品由家人珍藏，今为首度面世，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慈善。



张大千 乔木芳晖 一九四七年作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华商报》刊登台盟于五月七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文章。